

《虞初志》的编者和版本

程毅中

《虞初志》是一部明代人编的小说选集，除了《续齐谐记》是梁吴均的作品之外，其余都是唐人小说。它刊行的年代较早，版本又很多，因此对唐代小说的流传，很有关系。

现在所见到最早的版本，应该是如隐草堂刻本。北京图书馆所藏，原来是袁克文的藏书。书前有袁克文的题辞：“是书原阙总目，右目乃估人以意补写，故与原书舛异。初欲删去之，嗣以便于检读，遂姑存之。按《集异记》一书，清四库目及各家藏目，咸止一卷，惟铁琴铜剑楼藏有明钞本两卷，适与此合。”还题有一首诗：“小说梁唐州一篇，虞初旧志罕流传。伽蓝记外今逢此，如隐堂存两妙鐫。”袁克文所说“伽蓝记”，就是指如隐草堂刻的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向称善本，《四部丛刊三编》影印的就是这个版本。

这本《虞初志》没有序跋，总目是补写的，只有《莺莺传》的末页末行，有“如隐草堂”四字，可以据之定为如隐草堂刊本。如隐草堂刻有陆采的《天池山人小稿》，见《天一阁书目》。赵万里先生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考证说：“此书盖为长洲人陆采所刻。范氏天一阁藏书中有采所著《天池山人小稿》，内有如隐草堂之名。此《伽蓝记》之板刻字样正类苏州刻本，故疑为陆采所雕。”（转引自周祖谟先生《洛阳伽蓝记校释》序例）按《四

《四库全书》小说家类存目二著录有《陆氏虞初志》，书名上冠以“陆氏”二字，当有所据。这个陆氏当即陆采，可为赵万里先生的说法作佐证。本书的《续齐谐记》后，有跋语说：“右此记梁奉请吴均撰。或谓其续东阳无疑而作。余按均先有《齐谐记》一卷，在唐已失传，而其事往往杂见于诸类书中，均盖自续其书，非祖东阳也。是书亦罕得佳本，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，命余锓梓以传焉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这个“外舅都公”就是都穆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按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陆秀才采条说：“采字子玄，给事中子馀之弟，都少卿玄敬之婿也。”玄敬即都穆的字。

《虞初志》的如隐草堂本原来没有编刊者的署名，《四库全书》所著录的天一阁藏本就是如此，不过有“陆氏”的题名。现存本没有序跋和扉页，无从知道原书有无陆氏的标识。根据《续齐谐记》的跋语，可见原来是一个单刻本，是陆采按都穆的命令刻入《虞初志》的。后来的翻刻本有题作“汤显祖评点、钟人杰校阅”的，因此有人就认为是汤显祖所编。还有凌性德刻的朱墨套印本，内有汤显祖、袁宏道、屠隆的评语，前有王穉登、汤显祖、欧大任、凌性德的序。凌性德的序言明说是重刻前人的旧本，并非自己编纂的，但他也不知道原编者是谁。据陆采为他弟弟所写的墓志铭，陆采卒于嘉靖丁酉（十六年，1537），年四十一。《虞初志》编印的年代大约在正德末至嘉靖初，早在汤显祖之前，比凌性德就更早了。

如隐草堂本原缺总目，现有的目录是补抄的。原书除《集异记》分为两卷外，其余各种都不分卷，共三十一种，分成八册。第一种《续齐谐记》篇题下标明“虞初志一”四字。以下四种为一册，如第四种《虬髯客传》下标明“虞初志二”，第二十八种《任氏传》下标明“虞初志八”，而大多数篇名下则不标序次。因此以后的汤显祖评点本分为八卷是有根据的，而凌性德刻本却分

为七卷，毫无道理可寻。值得注意的是如隐草堂本只有《续齐谐记》、《集异记》、《虬髯客传》、《谢小娥传》、《莺莺传》、《霍小玉传》、《非烟传》、《高力士传》等八种署有作者姓名，其余各篇都不著撰人。而后出的翻刻本则加上了许多伪托的作者姓名，与鲁迅所说的《唐人说荟》一样，“妄制篇目，改题撰人”。如《离魂记》署名韦庄，《红线传》署名杨巨源，《枕中记》署名李泌，都是令人感到惊讶的。后来的《五朝小说》、《唐人说荟》等书都照此办理，可能还是受了翻刻本《虞初志》的影响。明人刻书往往随便“改题撰人”，造成很多混乱，流毒甚广。然而最初的编刊者陆采是不能任其咎的。《中国丛书综录》所著录的《虞初志》也是翻刻本，所以题作汤显祖辑，而且在各篇小说之下也都署上了不可靠的撰人。其实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如隐草堂本就不是这样。乱派作者的事恐怕也不会是汤显祖干的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。这个如隐草堂本除了《莺莺传》末有“如隐草堂”四字外，《集异记》的末行还有“弦歌精舍”四字。北京图书馆据此著录为“弦歌精舍、如隐草堂刻本”，那么是不是说这本书是两家合刻的呢？我们知道，“弦歌精舍”是明末毛晋的室名（或作弦歌草堂）。如果是毛晋所刻，年代就得推迟，不仅赶不上陆采，而且比汤显祖也晚得多，所以决不可能是合刻的。北京图书馆藏本书中有挖改的痕迹，不象是初印本，可能是如隐草堂的版片最后落到了弦歌精舍主人手里，又加以补刻重印。如隐草堂的初刻初印本，恐怕已不可得见了。北京图书馆另外还有两个《虞初志》的残本，一本除《集异记》末行有“弦歌精舍”字样外，《高力士传》末行还有“凤桥别墅”四字；另一个残本《李娃传》末行也有“凤桥别墅”四字。这象是更晚一些的重印本。每一篇后面有刻印者的署名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《百川书志》的传记类和《宝文堂书目》的子杂类里有单刻的《长恨传》、《高力士外传》、《虬髯客传》、

《莺莺传》等，与《虞初志》有共同的选目，可能当时有不少唐人传奇的单行本，陆采汇辑时还是陆续刻印的，后人又根据陆本重印或翻刻，作者姓名却逐步篡改了。自从《五朝小说》、《唐人说荟》等书流行以后，《虞初志》就不大为人重视了。然而它是明代较早的也是比较严肃的晋唐小说选本，在版本上有一定的研究价值。可惜它被翻刻者搞乱了，令人不敢引以为据。

如隐草堂本的刻印年代在谈恺刻《太平广记》之前，所以《虞初志》所收的小说都是比较古的版本，在文字上有不少优于《太平广记》的地方。例如《柳毅传》中的一段，谈刻本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一九引作：

妻谓毅曰：“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？然君与余有一子。”

毅益重之。既产逾月，乃秣饰煖服，召亲戚相会之间，笑谓毅曰：“若不忆余之于昔也”？毅曰：“夙为洞庭君女传书，至今为忆。”

《虞初志》“然君与余有一子”作“经岁余有一子”，“召亲戚相会之间”作“召毅于帘室之间”，“夙为洞庭君女传书，至今为忆”作“夙非姻好，何以为忆”：正好与陈鱣校宋本、沈氏野竹斋钞本《太平广记》相合，而且语意也比较合乎情理。

又如《南柯太守传》末，谈刻本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五引作“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……偶觊淳于生梦”，与上文说淳于梦“亦终于家”显然矛盾。《虞初志》作“……偶觊淳于生儿楚”，则通顺可解。可见《虞初志》还是唐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版本，而如隐草堂刻本尤其珍贵。以往书目中关于《虞初志》编者和版本著录的错误，在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中应该得到纠正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华书局